

【舌尖记忆】

煎饼往事

□冯涛

从小吃煎饼长大的我，吃煎饼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年龄大了，牙齿出现了问题，医生建议不吃或少吃煎饼。我接受了医生的意见，改吃其他食物充饥，但是与煎饼相关的往事仍常萦绕心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煎饼是老人家餐桌上的主食。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吃煎饼，还记得弟弟小的时候，经常手里拿着煎饼吃不到肚子里，跟在娘身边哼哼咬不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煎饼不能敞肚皮吃。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农活累的时候，要吃饱了有力气，多吃点大人不说话。在农闲或晚饭时，若要吃第二个煎饼，娘就说话：不下地干活，多喝点稀饭就行了。

我在公社中学住校那会儿，煎饼咸菜加开水就是一日三餐的食谱。一周回家一次带饭，每次娘都提示多带点以免不够吃。可看到娘烟熏火烤半天烙的煎饼都让我背走了，就不忍心。我总是按自定的标准带，严格按分量吃。周六放学后发疯样朝30里外的家跑，为的是回家找吃的。

有一年天灾粮食减产，煎饼原料不够吃，娘就向糊糊里边加东西。把粉碎的地瓜秧或稻糠用筛子筛细作原料。加糠后的口味都不美，但是有不同。加糠的咬一小口嚼一大口，还有苦味，颜色浅一些；加入地瓜秧的口感相对好一点，颜色漆黑。怕同学笑话，在集体宿舍吃饭时都不想让别人看见。这种煎饼水分大，不易存放，天热时易发霉长毛，更难下咽。就用开水泡洗后放上点咸菜，憋住气不闻味快速扒拉到嘴里咽下去。那个时候能吃一个不加糠的煎饼感到很满足，要想吃一个纯小麦煎饼只能等到春节时才有可能。

1979年参加高考走出农村，吃上了国库粮，从此煎饼淡出了我的食谱，它以另外的身份和我相伴相随。2001年去北京学习，班上有位新疆同学，由于时差原因，作息时间一时调整不过来，晚上睡得晚想吃夜宵，早晨起得晚错过了就餐时间。该同学和新疆建设兵团一位山东籍首长相熟，一起吃过煎饼卷大葱，感觉既美味又耐存储，求我帮忙。我请人从山东带去一包煎饼和大葱送给他，解决了他的难题。我们也因此成了很铁的好同学。之后有机会见面时常常想起这件事。

2007年系统内干部交流，我被交流到大连工作，不带家属，除了工作午餐有食堂以外，独自做饭，煎饼很自然又成了餐桌上的主角。在大连吃煎饼的人较多，集市上和超市里都能买得到，且品种丰富，有许多是过去想吃而吃不到的。适合卷煎饼的配菜也丰富多彩，鸡肉鸡蛋都能买得起。小时候吃过并印象深刻的鸡蛋炒辣椒或蒜薹炒鸡蛋成为经典保留菜谱。冰箱里不间断地存放着经我筛选的煎饼和配菜原料。

从大连调走时，按照到任时间安排，未来得及办理搬家等事宜。仍按此前出差一样，把家交由办公室的同事照看。一个多月后再回家时，老同事的作为彻底把我感动。打开家门，窗明几净，比在我家时还整洁。打开冰箱，我存放的煎饼和辣椒、蒜薹都在，感到安心，家中有饭心中不慌。但待我细看包装日期，却发现已不是我出门前存放的蔬菜，煎饼也是照我买的品种新换的。当时顿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已是离开大连的人了，老同事真诚以待，我倍感欣慰，令我至今经常想起大连，想起大连的老同事。

对煎饼的评价因人而异，有的人说是美食，也有人不敢恭维，我属于前者。生活条件好了之后，每一次回老家，面对可口的煎饼和合适的配菜不知不觉就吃撑了。客观地分析，从煎饼的原料构成到加工过程，就决定了其营养价值属普通食品，味道也算比较一般。喜欢的人是因为尝出了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过去想吃而没有条件得到的一种满足感。

【岁月留痕】

难忘知青岁月

□杨曙明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曾经获得过很多荣誉，记忆里获得荣誉最多的年份，当是一九七五年。

那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我高中毕业了，恋恋不舍地结束了四年半的中学生活。按照当时的政策，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兄长已经留城参加了工作。于是，我便顺应时代洪流，报名上山下乡，自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得在等待下乡前的两个多月间，我曾在济南卷烟厂干过临时工，岗位是在真空回潮工序打杂。那是个既脏又累，既热又呛的工种。当时的济南卷烟厂正在开展生产竞赛的“拉练”活动，由于我的吃苦耐劳和勤恳实干，在活动中被荣记“一等功”。这在几百号临时工当中，是唯一的一例。因为总结表彰会是在我下乡之后召开的，所以奖状和奖品还是母亲帮我领取的。

一九七五年，也是我参加工作之年。那年的10月10日，我来到了东阿县姚寨公社蔡楼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两年多的农村生活。

当时的农村，的确是锻炼意志、增长知识、丰富阅历的广阔天地，不过，当年的集体化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一些学大寨先进单位，劳动强度之大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黎明出工、挑灯夜战；天天如此，月月这般；没有节假日，更没有礼拜天；即便是寒冬腊月，也要修堤垒坝，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我所在的蔡楼大队就是这样先进单位。我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生的，下乡时正值年轻力壮。我又是积极要求上进的人，下乡之初就谢绝了大队对知青的所有照顾，不仅和当地青年同样劳动，而且还吃苦耐劳，处处走在前面。

我下乡那会儿，“三秋”尚未结束，天气已是秋凉，但我拉着地排车往地里送粪时，却经常热得汗流浹背，不得已就光着膀子劳动。我的“形象”被公社通讯员看到了，他在采访后，写了篇《光膀子的下乡知青》，投到了县广播站。这篇稿件播发后，我便在全县下乡知青中多少有了些名气。

当年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苦在三夏，累在挖河”。“三夏”之苦，苦在没白没黑、没日没夜的劳作时间长；挖河之累，累在从河里挖河泥，而后往岸上扔河泥，这都需要拼尽全身的力气。那年11月，公社组织青壮年劳力疏浚河道。大队原本没有让下乡知青参加的打算，但经过我再三主动请求，他们还是破例允许我参加了。那次疏浚河道虽然是在本公社辖区内，但要求却是吃住在工地，艰苦的劳作可想而知。在那次挖河劳动中，我不怕脏、不怕累的苦干精神，得到了公社领导们的高度赞扬，并让我在公社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中，进行了典型发言。我由此成了公社党委为下乡知青树立的学习榜样。

过后不久，当时的聊城地委要召开表彰会，分配给蔡楼知青一个“优秀下乡知青”名额。知青组最初推荐的并不是我，而是早我下乡一年的另外一位知青，因为别管怎么说，当时我下乡才仅有两个多月，时间确实短了些。但是，名单在大队党支部审核时被卡壳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推荐优秀知青，不能光看下乡时间长短，要看谁表现最好。”于是，我就成为大队党支部推荐的不二人选。公社党委也同意了大队党支部的意见。这就让我们知青的带队干部和公社负责下乡知青工作的民政助理员犯了难。为此，他们特意到县知青办沟通协调后，又给蔡楼知青点追加了一个名额。我就这样成为“聊城地区优秀下乡知青”，并在不久后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作了发言。也正因为我的突出表现，在来年5月份，也就是在我下乡插队才七个多月的时候，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没有预备期之规定，我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这在全县下乡知青中是第二人，在同期下乡知青中是第一人。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快五十年了。记得当年我曾珍藏了很多奖状，可是如今它们都不知所踪，但每每追忆仍颇感欣慰。

【生活小景】

“不可理喻”的爱

□潘万余

“不去了，不去！不去！”电话里，父亲面对我的邀请，回绝得斩钉截铁，理直气壮。没办法，孝顺就得顺，顺着他来吧。

父母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多年以前我和妻子带着他们老两口在济南、青岛游玩了一圈。现在每每想起老两口面朝大海，坐在快餐店里吃汉堡喝可乐的场景，我的心里还会漾起一份甜蜜，涌起一丝酸楚。十几年前母亲离开我们后，父亲就一个人住在高邮农村的老房子里，由同村的二姐一家照看着。每回从监控里看到父亲孤独地屋里屋外转悠时，我和妻子想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愿望便会越来越强烈。2017年，二姐被我们磨得实在没招了，答应陪同父亲一起前往。那也是我第一次现场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这种陪伴完成了我久存于心的愿望，自豪感溢满心头。现在品咂起来，女儿拉着她爷爷，一老一少漫步故宫的背影仿佛就在眼前。

一晃又近十年，换了大房子后，想让父亲来新家看看便成了我和妻子的又一个心愿。前几次邀约，父亲都以腰腿走不动推了。今年，女儿上高中已住校，我和妻子还有公休假，加之进入冬季后天气异常寒冷，我就特想让父亲来济南温暖过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但父亲均不为所动，且态度坚决。

无奈放弃游说，但父亲不愿意来济的原因却始终让我费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探寻到了父亲回绝得如此“理直气壮”的缘由。那天，我突然记起父亲曾在电话里跟我提起过，说是老人岁数大了在子女家住会折子女的寿。天哪！难以想象一向开明的父亲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想法！我当时还耐着性子，列举例子来反驳他。没想到，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在父亲的心里根本无法撼动！

二姐发来信息也证明了我的猜测，她告诉我，父亲也曾跟她提过，说希望自己百年归西前所有的子女都好好的，所以，他哪里也不去，就留在自己的老屋子里，不去子女家住。

看着二姐的信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鼻子发酸，喉咙里像是被堵了般难受。怔怔地，我仰望着天花板，瞬间大脑里一片空白……

两年前，二姐进城陪读，只能一周回村看父亲一次。家人便请了位庄邻，专门给父亲做饭、陪他说话。父亲照例每天骑着电动轮椅车，拖着小黄狗，在他曾经健步如飞的乡间小道上“巡视”，遇见熟悉的乡邻聊上几句，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现在的父亲已经是耄耋老人。他耳朵背了，腰更弯了。我知道，父亲一个人孤独时总会瞎琢磨，就连他自己从哪里走到生命的尽头都在替子女着想，哪怕这个想法是如此难以置信和不可理喻。父亲对子女的那份爱已深入骨髓。